


“国史”——一个逝去的时代·胡作奇
“六经国史”说《论语》·曹琳
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许纪霖
重审八十年代人的文化关怀·余正琳
到喇嘛去扶思想呢·江晓原

“荒唐”从“荒凉”开始·王宇泰
大唐帝国：李思德不在以后·十年敦煌
自象玩动的庄庭：一曲书写的颂歌·黄道炫
爱国民党在中国的命运沉浮·国寿仁

“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西
林语堂：何以从“斗士”变“逸士”·王光明
庄静立：息庵风月能管弦·北塔
凉仄空旧舞·花开正满枝·碧晓风
逻辑的悲剧·胡作奇

王朔的“新长”·王说清
一个人与半程才疏副刊·何文
《新长》：要讲有天真童心·陈坤
陈坤下流所难及也·志于建
陈嘉庚三和梁林光的差别·李筱峰
村上春树：虚无的彼岸·林少卿

读书一年间·葛兆光
记忆就是财富·葛兆光
知识分子与时代·徐友渔
读书又一年·止庵



思想的背影

王洪波 编
青岛出版社

思想的背影

王洪波 编 青岛出版社

思想
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背影 / 王洪波编.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8.5

(思想者文丛)

ISBN 978-7-5436-4779-4

I.思… II.王…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3099号

书 名 思想的背影(思想者文丛)

编 者 王洪波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80998664 传真(0532) 85814750

责任编辑 刘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特约编辑 贺中原 胡修江

装帧设计 良友书装·李欣·毛海红

平面制作 杰人平面设计公司

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尔丰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1000mm)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千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978-7-5436-4779-4

定 价 26.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0532-80998671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处调换。

电话:(0532) 80998628)

感谢《中华读书报》的领导庄建、王小琪两位老师，正是在她们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才有了《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的创办。感谢吕文浩、咸江南、丁杨、陈香等，本书中很多文章是由他们约稿、编辑的，也包含了他们的心血。另外，《中华读书报》实习编辑张彦平对书稿作了通校，在此也表示感谢。

编者的话

“思，思考、思索、思辨。想，梦想、遐想、理想。思想，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思想者，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这是我们印在《思想者》第3辑封面上的“题解”，也是召唤着我们的一个理想。思想体现在思想者的言说中，思想的乐趣和思想的沉重同样承载着思想者的多彩人生。本辑《思想者》文丛仍然承续着《思想者》第3辑的编选宗旨：所思所想、所读所感、往事与记忆、人生与现实。不过，相比于《思想者》第3辑三本书中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生情怀，为现实的记忆或说个人生命体验的时代烙印成了《思想者》第4辑的主旋律，这种人生记忆与时代风云的相互印刻尤其体现在本辑中的《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和《私人记忆》两书中。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邵建编）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与事来映照百年来中国的沧桑风云，其所收入的人，既有蒋梦麟、徐志摩、何炳棣、林同奇等现代中国的指标性人物，也有智效民、程巢父、沈睿、范泓、蒋丽萍等活跃于当代的学者作家。既有人生晚年对扰攘不安岁月的回忆，也有当下对20世纪初的人与事的回顾与解读。譬如蒋丽萍的《遥望冬皇》和桑农的《何人绘得萧红影》，分别通过伶人孟小冬和作家萧红两位拥有不同人生的女性的解读，映照出了那个年代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而何兆武的《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和林同奇的《林氏家风》如同陈列出了独特而丰厚的两个已无法再生的化石标本。

《私人记忆》（张耀杰编）更注重个人的生命烙印，这个生命烙印既有对个人的人生“拐点”的记忆，也有对“他者”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记忆，前者如：《年轻的北大教授》（陈翰笙）、《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贾植芳）、《我的1976》（赵世坚）、《我自己

的经历》（谢泳）、《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孙国栋）、《后平房改造风波》（杨支柱）等，后者如：《关于唐达成的回忆》（邢小群）、《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常风）、《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钱理群）、《我的朋友史铁生》（徐晓）和《走近胡适先生》（邵建）等。而“父亲”更成了人生成长的一个基点，譬如：《我的农民父亲》（鄢烈山）、《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迟宇宙）、《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橡子）等。

邵建的目光投向的是一个世纪，注重的是在岁月中的人生沧桑，他所选择的是能反映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故事，如同一幅地图，他贴上去的是一个个驿站的坐标，希望藉着坐标上的人与事，绘出百年来人生地图的细枝末节。而张耀杰的落脚点是指向今天的个人记忆，不管是关于往昔的回忆，还是对亲人师友的缅怀，都指向了一个目标，这就是面对当下的个人生活。温故而知新，这也是《私人记忆》与《一个世纪的人与事》的共同点。

《思想的背影》（王洪波编）在文章的体裁和内容上明显不同于上述两书，但在主题的宗旨上仍属于异曲同工，不过更体现了《思想者》文丛关于“所思所想、所读所感”的追求。与张耀杰、邵建的学者身份相比，作为报人的王洪波更多关注当下的读书界的过眼风云。《思想的背影》一书，系《中华读书报·阅读周刊》所刊文章的精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这也许就是《思想的背影》的特点所在。《重审80年代人的人文关怀》（朱正琳）、《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虽是所读所感，但更是个人的阅读记忆与印象，所关注的仍是世纪风云下的人与事。

编者

思想者

- [001] “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胡伟希
- [005] “六经皆史”说《论语》·雷颐
- [008] 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许纪霖
- [013] 以“法学之眼”看文学经典·罗春伟
- [018] 重审80年代人的文化关怀·朱正琳
- [026] 一本书的廿年阅读体验·王铭铭
- [031] 远距离看“美国平等的历程”·朱正琳
- [036] “欧洲梦”开启的生命意义追问·乐黛云
- [039] 全球化时代重审斯宾格勒的“预言”·李秋零
- [043] 资本主义没有神圣的光环·冯聿峰
- [047] 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
- [051] 知识经济的神话·田松

- [054] “吏治”从“治吏”开始·王学泰
- [058] 大唐帝国：华彩掩不住血泊·十年砍柴
- [061] 尽现女性文采风流·刘志琴
- [065] 知识分子论政的启示·唐小兵
- [068] 倾听“无声的群落”发出的声音·定宜庄
- [072] 启蒙运动的生意：一曲书商的颂歌·黄敏兰
- [078] 被遗忘的政治遗言·景德祥
- [082] 德国“鬼子兵”看“二战”·李洪岩
- [085]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

思想者

- [089] “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
- [093] 林语堂：何以从“斗士”变“逸士”·王光明
- [096] 汪静之：岂是风月能笼盖·北塔
- [099] 毛彦文：感情生活的高与丰·宋文佳
- [103] 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王一方
- [107] 泐灭全归海 花开正满枝·祝晓风
- [117] 逻辑的悲剧·胡作玄
- [121]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相对论”·陈克艰
-
- [126] 玄幻文学：时代的犬儒主义·陶东风
- [131] 王朔的“新装”·王晓渔
- [137] 一个人与半醒半睡的村庄·何英
- [140] 存在的呼告 神话的变奏·阎晶明
- [144] 《后羿》：碧海青天夜夜心·徐坤
- [147] 大自然殿宇的伟大朝圣者·楼肇明
- [151] 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
- [154] 难忘陀氏《罪与罚》·周大新
- [157] 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徐迅雷
- [161] 女人、紫罗兰和扇子·高兴
- [166] 《洛丽塔》：“美丽的绿苍蝇”·程巍
- [169] 作家李三和施林克的差别·李敬泽
- [172] 帕慕克：土耳其文学中那根“最高的枝条”·邹海仑
- [176] 无用的女异人·云也退
- [181] 村上春树：虚无中的独舞·林少华

思想者

- [184] 读书一年间·葛兆光
- [187] 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
- [190] 知识分子与时代·徐友渔
- [193] 读书又一年·止庵
- [196] 没有大红大紫，不是它们的错·孙小宁
- [199] “毛边本”余话·秋禾
- [203] 苦乐为书·涂涂
- [206] 有女如书·半夏
- [209] 说三国：闲话谈心，有会于心·沈胜衣
- [213] 斯人已逝，“道尊”何存·吴小龙
- [217] 何时不再念斯人·马勇
- [221] 乘着童谣的翅膀飞跃时光·与畴

“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

胡伟希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繁荣的时代，以至于到今天，人们仍对这个时期为何学术大师一时云集，辉煌的学术著作出现如此之多而惊讶不已。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被公认为中国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大师，几无不在这个时期集中显示光芒。人们在怀念之余，不由得又发出叹息：为何到后来，中国学术界难以再现往昔的辉煌？这些学术大师的造诣，后人为何难以企及？

上个世纪20年代初，作为曾经历过这一时代，并且也在这个时期成名的钱穆，历时五载，以八十八岁高龄，完成了《师友杂忆》一书的撰写。如他所言，这本书不只是他过往一生的记录，而且是想使他那个时代学界的“前世风范犹有存留”，给后人提供他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界的一种“存照”。故此书不仅对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变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画，而且记录了20至40年代作者与之交往过的许多学术精英人物的言谈事迹，乃至身世背景。因而，此书无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资料，而何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会出现学术“高峰”，从中也可以获得某种启示。

此书作者钱穆是世所公认的国学大师。提起国学大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饱读“四书五经”之类。的确，假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

籍不熟悉的话，一个人要成为国学大师是根本不可能的。20世纪20至40年代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这批人，几无不在“旧学”方面有相当的根底，而且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染。此不独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钱穆等人如此，即便是以“反传统”和“西化”著称的学术人物，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亦如此。因此，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自小饮“国学”之母乳长大，几乎是20至40年代成名的这批学术人物的共同经历。这方面，《师友杂忆》记录了许许多多学术人物的出身经历及治学背景，可作为这种看法之明证。

然而，对于成就为现代国学大师来说，仅仅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与国学素养还不够。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这些国学大师，他们之所以在许多学术问题上超越了前人，包括乾嘉学派，就在于他们不仅具有传统学术的根底，而且又经受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西学”相当重视。这点，胡适在其“自述”中曾一再指出。而《师友杂忆》更是以相当多的篇幅，向世人展示了20至40年代这批学人，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西学背景与西学渊源。即便未能读上现代型大学，完全是“自学成才”的钱穆，也无法自外于这种时代潮流。此书讲述了他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那些接受“新学”洗礼的老师；直到中年以后，他自己还继续自修英文，通读英文《世界通史》等著作。钱穆自述：他后来写成文字的许多学术文章，其思想的胚胎其实很早就受孕于他读小学和中学时所受老师的影响，而这些中、小学老师，不仅于旧学有很好的功底，而且善于向学生们传授“新知”与“西学”。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他小时候通过读梁启超的书而间接接受了西学的启蒙与熏陶。

但通读全书，我发现：学人们对于学术的执著与忘我精神，以及在这种基础上相互“问道”，乃至不同学术观点、思想立场的相互驳难而又宽容，恐怕才是20至40年代学术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原因。

《师友杂忆》中最感人的地方，是记述了当时学人们如何为追求学问而废寝忘餐，以及因为学术而相知、相遇的故事。这中间，既有钱穆本人经历过的，也有他通过听说而记录下来的。书中有这么一个细

节：章太炎来北平作学术演讲，尽管他的早期弟子钱玄同、刘半农已改宗“今文经学”，与乃师的“古文经学”不合，但“太炎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而台上此二人，即当时在学术上主张“全盘西化”甚烈，且狂妄不可一世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可见，对于学术的投入与执著，是已经超越了学术立场的。书中还记载：1930年代初，钱穆任教北大时，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因学术得以相识，成为好朋友，时时相聚，然“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正是通过这种既相争又相让的学术争论，学人们各自的学术思想观点才得以发展和受到检验。

对学术的兴趣与挚爱，在当时不仅仅是学界中人之事，而且有着社会的广泛基础。作者生长在江浙一带，从小就感受到这里有浓厚的“诗礼传家”的人文气息，以及家乡人们对于教师的尊重与热爱。作者对国学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在他读小学的“果育学校”，延聘的老师中就有不少是宿学硕儒，其中包括像紫翔这样对于古文词娴熟于胸的传统文人。作者自述说：他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而这个观点，则是紫翔老师在他童年读书时给他的启发。这些乡间的读书人不仅旧学功底深，对于国学向来有一种发源自本然的爱好；而乡下不识字的人，对于读书人也有一种本能的爱戴与尊重。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荡口是离县城四十里外一个小镇，在果育小学任教的一名有名望的老师倩朔师每周从苏州城一中学兼课都要从此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拱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作者不由得发出感慨：“然今日农村及僻

远小镇之小学教师姑不论，即在商业都市中，小学教师能遭此异遇者有几。宜乎位为小学教师者皆自菲薄，不安于位，求去如弗及也。”看来，至少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以前，在中国乡村小镇，在尚未完全“工业化”、不崇尚“竞争”的时代，有一些饱读诗书之士，是以安于少年儿童教育为己业的。而作者本人，也曾以当一名小学教师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重视基础教育与底层教育的旧学传统，才最终为20至40年代造就了一批国学人才。

由此观之，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递变之时；这个时期是旧学未去，新学已来，种种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不仅未导致中国文化的断层，反倒造就出一个“国学”复兴的时代。而今，数十年的历史沉浮已成过去，人们在反思之后，又缅怀起那国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于是，有人又提出“国学复兴”的口号，并且有所谋划，希望在“国学复兴”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国学”仅仅是提出某种口号，或者经过人力的试验就可以成就的么？读罢《师友杂忆》，不由得掩卷叹息：

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

“六经皆史”说《论语》

雷颐

诚如李零自己所说，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这“三古”吃饭的。他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领”，通过精湛细密的训诂考据，还原了《论语》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点，引起了一些不满，认为此书“只是训诂”，并贬低了《论语》、孔子的思想、文化意义。但我认为，这恰恰是此书的意义所在。

在“五四”以前的千百年间，《论语》一直是儒学、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圣先师”，二者自然一直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五四”以后的几十年间，《论语》与孔子骤然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却又突然“走红”，大有再成“圣经”、“圣人”之势。在这高低反差极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这些“背后的因素”甚至起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种起关键作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为基础、依附的阐释中发生、演变、展开的；在历史、思想史的进程中，对“文本”叠加、附会了越来越纷繁、丰富、精巧、华美、恢宏的意义，往往掩盖、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盖、遮

蔽了在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素。因此，对“文本”的训诂考据不仅还原了其原初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还原”过程中一层一层剥去了在漫长历史中层层附会、越来越浓厚的绚丽油彩，揭示、显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因素。正如李零所说：“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现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强调“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样。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现在，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这种“打假”，就是通过《论语》的“历史性”而不是“义理性”解读。在他的分梳中，“活孔子”“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珂德，可笑也可爱”，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说的乌狗，今人说的摆设、道具和玩偶。历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这种“越高”、“越假”，就是意义的不断附会、层层叠加。通过对“死孔子”的标本分析，李零得出了与“五四”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结论：“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汉武帝（及其以后的帝王）的“独尊儒术，目的不在复兴学术，而在统一思想，令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千百年来，影响、支配、掌控人们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对“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义。

批评李零此书“只是训诂”，还表现出了“义理派”对经典训诂工作的不屑。其实，“义理派”的陈义虽高，却极易流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一路，那种凌虚蹈空建构起来的宏大理论体系，倘落到实处，很可能有害。有鉴于此种学风之弊，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批评说：“明人讲学，袭语灵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所以他强调学者必先穷经，欲免迂儒必兼读史。实际上，放谈心性的王阳明自己早就认为那些以己为师、喜欢放言高论的游学之士可能为害不浅，自己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因此，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论影响广大，所以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当时学风之弊，批

评当时的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他的名著《廿二史考异》便是针对此风的“有为而作”。他问道：“经与史岂有二学哉？”表明了对长期的“经”、“史”分开的不满。对“义理派”一向认为“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观念，他也坚决反对。

在以历史的方法“解经”方面集大成者，当属章学诚。他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当然，狭义地说，《论语》不在这“六经”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他还以孔子著《春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经世也。’”“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

作为儒学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论语》同样可以、而且应以“历史的方法”解读，从“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寻求其“义理”。李零此书有专说“孔门弟子及其他”的导读，附录中专门制作了“《论语》人物表”，足见其对“人事”的重视。如今“离事而言理”、“于人事之外”别求义理早已成为学界风气，学者似乎越来越不屑探究“理”后之“事”，越来越不愿追寻“文本”之后的真相，越来越想凭空建构宏大理论体系……因此，《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格外有意义。

很多时候，将“事”训诂得清清楚楚，“理”其实也就明明白白了。

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

许纪霖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试图重新梳理出一条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脉络。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是一个外来词，过去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更多地以欧洲的知识分子理想类型作为参照，来观察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种传统/现代二分法的现代化研究模式支配之下，中国的前知识分子——传统的士绅一直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即使有的话，也多是作为负面的形象出现，以此证明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目的论之正确。

近年来，随着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多元现代性模式的出现，“重新发现中国”和“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学人的自觉追求。如何在中国重新发现知识分子的历史？如何透过看似断裂的20世纪地表，重新发现埋藏在深层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独特性？在这样的知识转型背景之中，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和“士绅社会”，便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所谓的“士绅社会”（gentry society）这一概念，最早由费正清提出，按照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描述，“士绅社会”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